

白话中国古典精萃文库（卷四十六）



# 东京梦华录

——北宋汴京的琐闻杂记

（文化普及珍藏版）

共52卷

# 东京梦华录

杨 羽 编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辽新登字 3 号

东京梦华录——北宋汴京的琐闻杂记

dong jing meng hua lu——bei sheng bian jing de  
suo wen za ji

杨羽 编著

---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:157 千字 开本:787×1092<sup>1</sup>/<sub>32</sub> 印张:7

1992 年 9 月第 1 版

199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

---

责任编辑:任 宁

封面设计:王凌波 胡萍丽

责任校对:刘 强

---

ISBN 7-5313-0884-3/I·807

4.72 元

总定价:258.00 元(套)

## 原著者简介

# 东京梦华录

本书作者为孟元老，南宋时人，但生平不详。严格地说，他是北宋末至南宋初时人，出身于官宦家庭，得以随著家人游历南北。在宋徽宗崇宁年间到达当时北宋的首都汴京城，直到靖康之祸时才离去往南，他在京城居住了二十三年之久。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写出了梦华录。

梦华录是带着写回忆录的心情来写。南宋初期仍在兵荒马乱之中，孟元老亲眼见到北宋亡国之痛，也亲身经历了北宋晚年首都的繁华景象，这两种强烈的对比，有人一生中未必能遭遇到。自号为幽兰居士的孟元老，在回首往事、抚笔追述之时，他说：“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，其乐无涯者，仆今追念，回首怅然，岂非华胥之梦觉哉！”前尘往事如在梦境。

孟元老可能只是出身官家，但本人恐怕不是文人学士，也因此他写书是白描，不渲染嗟叹，却能引人嗟叹，不刻意安排，倒能见其妙手，这也是我们对作者的了解。

# 目 录

## 第一篇 前言

- 一、作者与书 ..... ( 2 )
- 二、东京开封 ..... ( 6 )

## 第二篇 城门与河桥

- 一、东京的新城与旧城 ..... (14)
- 二、河道及桥 ..... (24)

## 第三篇 皇城与政府

- 一、大内皇城 ..... (34)
- 二、内、外诸司各机构 ..... (43)
- 三、军队的概说 ..... (53)

## 第四篇 街景与市容

- 一、御街及宣德楼前的街道建筑 ..... (60)
- 二、朱雀门外街巷 ..... (62)
- 三、东角楼与潘楼东的街巷 ..... (66)
- 四、右掖门外及州桥东面的街巷 ..... (71)
- 五、相国寺的内外 ..... (74)
- 六、宫寺庙宇 ..... (79)
- 七、医铺及其他 ..... (82)

## 第五篇 饮食与生活

- 一、夜市及酒楼 ..... (88)

- 二、饭馆店摊及饮食····· (91)
- 三、杂卖及其他行业····· (99)
- 四、伎艺的特写····· (102)
- 五、民性与习俗····· (116)

## 第六篇 官方的节庆和仪卫

- 一、仪卫及皇室出行····· (130)
- 二、元月的节庆····· (133)
- 三、淡淡的三月天····· (143)
- 四、皇帝的生日····· (160)
- 五、寒冬的大礼····· (169)

## 第七篇 民俗与节日

- 一、春的气息····· (180)
- 二、夏日寂聊····· (188)
- 三、秋兴正浓····· (193)
- 四、冬年岁暖····· (199)

## 原典精选

- 附录一 宋徽宗艮岳记····· (204)
- 附录二 教坊乐部····· (207)
- 附录三 圆社摸场····· (209)
- 附录四 小说····· (211)
- 附录五 大起居····· (213)
- 附录六 宋史礼志中所记天宁节上寿仪····· (215)

# 第一篇 前 言

## 一、作者与书

东京梦华录又简称为梦华录，或者称为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；幽兰居士是作者孟元老别号的。作者的生平已无可考，本名也不能确知，“元老”可能是他的名字或者只是字。根据清代藏书家常茂来的推测，认为作者即是宋徽宗时的户部侍郎孟揆，他是当时首都一大名胜的督造人。原来北宋时道教发达，宋徽宗更是崇信道教，故而接受道士的风水说法，在京城上清宝篆宫之东筑了一座假山，名为“万岁山”；因山在“艮”方，故而又叫“艮狱”了。“艮狱”建于宣和的壬寅年，即宣和四年（一一二二年），徽宗还亲自写了一篇纪念的文章“艮狱记”（参见附录一）。以梦华录的内容来看，作者详细地记载了北宋首都汴京（开封）的建筑、街市、名胜，以及官方的机构、庆典等等；对于一些宫廷的生活、仪典也非常熟悉，应可以约略推知作者的身份与职掌。那么像“艮狱”这样著名的胜迹可以只字不提？我们可以这样解释：因为宋徽宗生活享受，当时有个名作朱勔的官员，为了迎合徽宗的欲望，采尽了天下的花石来进贡，运送这些花石的船只，舳舻相望，号称为“花石纲”，并且还特别在苏州设了机构叫“应奉局”的来负责其事，这种花石之役使江浙一带的百姓受害最深，怨声载道而恨不得食朱勔之肉，这也曾引起地方上的叛乱。

“艮狱”就是用花石所筑，在这种背景之下的“罪迹”，必为天下后世所指责，故讳而不提，企图隐藏起来。根据这种推测，孟元老似乎就是孟揆了，不过却没有其他的证据来支持这种推测，因此只能备为一说，暂且存疑吧！



本书写成于绍兴丁卯年，也就是南宋初期的高宗时代，绍兴丁卯是十七年（一一四七年），距离北宋灭亡约二十一年，作者就是追写北宋末年首都的情形，而大多是徽宗崇宁到钦宗靖康（一一〇三～一一二七）年间的往事。

书的内容包罗了许多方面，有各形各色的商店、街景、酒楼、饭店、摊贩等，穿着、饮食、娱乐也有极详细的描写。又因为是当时中国的首都之故，所以宫廷中部分的生活情形，以及朝廷的一些庆典活动，自然也免不了要呈现出来，同时对中央政府各机构的分布位置，门楼市区之规划等等，在书中也有相当详细的记录。虽然这些都是用回忆录式的叙述，像杂记体裁般的，但却能突现出那一时期首都的商品经济、国民生活等，也就是重新建构了近千年前中国社会面貌中的一个城市造型。

在学术上而言，本书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的城市社会生活，而且有更活泼、丰富的面貌，成为有关经济史、社会史、文化史等方面的重要文献，至少有关中国商品经济上升时期的社会经济情况，新兴的市民阶层的物质生活、文化生活等状态，都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。

为了进一步了解作者写这本书的心意，现在不妨来看看他在书前所写的序文，他的自述是这样的：

我幼时随着先人在各地作官的机会，而游历了南北各地，在崇宁的癸未年（一一〇三年）到达京师，卜居于城西金梁桥西夹道的南方。而后渐渐长大成人，当时正在长期的太平日子之中，物资丰富，人物繁盛，孩童们喜学歌舞，老年人安稳度日，而不识干戈为何事。由于节的不同，就有各种各样的景色，有灯宵、月夕、雪际、花时、乞巧、登高、教池、游苑等等节庆宴游之景。

若从城中举目望去，是青楼书阁，绣户珠帘，华丽的车子排满了街头，名贵的马匹络绎不绝地跑在路上，放眼是耀目的一片金翠，鼻嗅的尽是罗绮的飘香。在柳陌花街有巧笑的新声，在茶坊酒店有歌舞的管弦。那时各国各地的人才、物品都集中在此，因此市面上可见到四海的奇珍异宝，而餐馆里不乏各种各样的口味食品。这正是花光满路，何限春游；箫鼓喧天，几家夜宴！那情景是艺伎巧妙正足惊人之耳目，而侈奢铺张真是叹为观止啊！

谈到政府方面的庆典，则有元夕、教池、郊拜、孟享等，还有公主、皇子们的婚姻大典，至于工程修建之壮丽，又有如明堂、鼎鼎的建铸等。要看享乐风光，有各级显贵达官的冶游宴乐；要看荣耀排场，有士人中举、武官授阶等等。

我在京的数十年间，看遍了这种富丽奢华而仍不知足。一旦烽火兵灾来临后，只得在靖康丙午（一一二六年）的第二年离京南下，到了江南地方躲避战乱，此时心绪是非常的消沉没落，而岁月也渐渐步入了晚年。暗里回想往日的时光，节物之风流，人情之和美，都不过凭添今日的惆怅。最近曾与亲友们谈天，说到当年的情景，后生晚辈们常常不能明了，我恐怕时间久后，谈论及当时的风俗状况，可能会失于事实，这是非常可惜的，于是就回忆往昔而记录下来，编写成的这本书，可使读者能看到当时的盛况。

古人曾有梦游华胥之国的故事，觉得有无比的快乐，但我今天追忆往事，回首怅然之情，岂不正像梦游华胥国一样？故而称之为“梦华录”。不过以京师的浩繁盛大，

以及有不曾经历之处，因此某些记载是得于旁人所述，不免或有缺失之地，如果有乡里宿德之人，能加以补充之，则不胜幸甚。关于本书有俗语俚语，没有加以文饰的地方，是为了大家都能通晓之故，望读者能明察之！

绍兴丁卯年岁除日 幽兰居士孟元老序

在这篇语译的序文中，很明显地看出作者对当时京城观点，简单地可以繁华、富足、奢侈来形容它。然则荣华富贵有如过眼云烟，追忆往日，又恍如一梦，在空余惆怅之际，孟元老写下了他岁月中最值得回忆之处，在文字之间，也塑造了栩栩如生的景像，使我们后人就其中可以重建当时的面貌，不正如孟元老在序文中所说的心愿一样吗？

其次再举几个图书目录方面的看法。据“文献通考”经籍考中说，南宋陈振孙的“直斋书录解題”，收有东京梦华录一卷，列在史部的地理类，陈氏认为书的前面几节中，全是记载京城宫阙、桥道坊曲等的详细情形，故而列入地理类中为宜。赵希弁为晁公武的“郡斋读书志”写附志，也列有梦华录一卷，同样放在史部的地理类中。他们都看重书中所记的社会生活、街市景物等等。著名的“四库全书总目”，收有十卷的东京梦华录，是汪汝藻的家藏本，在提要中说出了本书记载的特点所在，从坊市、节俗、典礼、艺术等都无不记述，虽然是识小之流，但朝章国制等，却杂在其中，而且与“宋史”中的记载偶有出入，正可用以互相考证，来辨定伪误之处。提要的说法正指出本书的重要价值的另一个方面。

关于本书的版本方面，现在流通的有下列几种：一是日本静嘉堂文库影印黄丕烈旧藏的元刊本，二是秀水金氏梅花草堂影印的汲古阁景写宋本，三是明代胡震亨的秘册汇函本，

四是清代张海鹏的学津讨原本，五是涵芬楼据明钞百卷刊本说郭所引的刊本。

所谓静嘉堂文库的本子，原是明代顾元庆所藏之书，清代为黄丕烈所有，而后归陆心源，然后转入日本静嘉堂文库。这是较好的本子，可以校正秘册汇函、及学津讨原两本，但静嘉堂的元刊本也不免有些许误字，故而仍需要其他本子来校勘。汲古阁的景写宋本，是指明代毛晋所藏，但张元济在涵芬楼烬余书录中，断定为景元的抄本，因此本书也就无所谓宋本了。至于说郭本，只在卷九十一中，引了孟元老的自序文，以及本书的卷二部分，不过亦与其他本子有所异同，仍值得拿来校勘之用。

## 二、东京开封

宋代政治制度中，设有四个“京府”，它们是东京开封府（河南开封）、西京洛阳府（河南洛阳）、北京大名府（河北大名）、南京应天府（河南商邱），这四个府不同于其他一般的府，而四京府中，又以东京为首都所在，地位更显得特出。

以府作为政制单位大约始于唐代，在唐以前是行州、郡之制，其下辖县。宋代的地方制度，府、州、军、监是属同一级的政治单位，但地位却有不同，府在同级中是最高的。京府则不属地方政制，而为中央直辖的单位，有点像今天的院辖市一样。

东京开封府在宋代建为首都以前的情形，可从沿革的大略中看出来。现在参考史书以及“河南通志”，与“开封府志”的沿革表作一简单说明：

在上古三代时期，开封属于兖、豫二州的范围之内，在

春秋时代分别由许多邦国治理过，它们是郑、陈、许、蔡、东号、杞、郕、顿、项、沈、胡、戴等十二国。战国时代属于魏国，并且建都于此，号为“大梁”。秦统一天下后，开封成为三川郡东北部的大城，后来又划为颍川郡的北部。到汉代时属于陈留郡，为兖州刺史辖下之地；东汉也是如此。三国时代属于魏，把陈留郡改为陈留国，仍然为兖刺史所管辖。替代依旧不变，但当时以“小黄”为陈留国的首邑，有人认为“小黄”就是开封。

南北朝时代南朝的宋把陈留国改回为陈留郡，后来为北方的魏所占有，把它放在梁州的范围之内。北魏分裂为东、西魏后，属于东魏的梁州，但开封、陈留分开为两个郡。北齐继续东魏的政权后，又把开封并回陈留郡之内，属于梁州的范围。北周并灭了北齐，把梁州改名为汴州，因为它面临着汴河之故。

隋初把陈留郡废除而以汴州替代，炀帝时期又把汴州废掉，其所统辖的县分别被并到荥阳与颍川等郡之中，开封似乎是属于荥阳之内。唐代武德四年（六二一年）恢复为汴州之内，属于河南道。到天宝元年（七四二年）改属于陈留郡之内。乾元元年（七五八年）又恢复为汴州。与元二年（七六一年）在这里建立了宣武军，朱全忠就是宣武节度使；他后来建立了五代开始的第一个朝代——梁，于是把汴州升为开封府，并以之为首都。初期所统辖的县有六个，它们是开封、浚仪、陈留、雍邱、封上、尉氏等县，后来又增加了九个县。后唐把开封府降为汴州的宣武军，开封城又恢复回唐代末年的地位了。后晋天福三年（九三八年）仍照后梁初年的建制，开封府地位又成为全国首都的地位。后汉、后周都依旧不改，一直到宋代也如此。

开封建为首都成全国政治的中心，由上述的沿革看来，是从五代的后梁开始的，除去后唐以外，五代的四个朝代都以为之都，宋代建国后也因袭不变。开封受到如此地重视必定有其原因。若从秦汉一统天下的局势来看，首都的发展有由关中趋向关东的倾向，也就是渐向东方发展，下面就要对这问题提出一个大略的解释。

首先看官方对于建都开封是怎么说的。后梁建都时发表的诏书，说开封是“兴王之地”；因为朱全忠建国之前是在这儿当宣武节度使的，也就是说开封一带是他的根据地。

后晋建都时则说，开封是“舟车所会，便于漕运”，着重于交通发达的地理位置，为的是财经问题。

宋代也指出开封一带的交通地位，以及物产的富足与社会风气的良好，主要的还是重视它“处四达之会”的好条件，目的仍在财经上的漕运问题。

就这些资料来看，已经明显地揭示出他们建都在开封的用意何在。现在我们再作进一步地解说，为什么那一时期财经问题会这样受重视？建为首都的条件又要考虑那些？开封又是否为最恰当的建都之地呢？

通常古代的首都较注重地势的险要，“易经”上说：“地险、山川丘陵也，王公设险以守其国。”就是以地理的险要在于山川丘陵的屏障，各邦国执政的王公们就是以这险要的地势来守卫领土，这成为古代的一个传统看法。

地理条件除去自然环境之外，还有物产、人情、风俗、交通等等考虑，这些问题古人早有注意；例如“禹贡”里对九州的记载情形，“管子”水地篇里谈到的各地特性与民俗，“庄子”天下篇里说到各地的文化与学术。“史记”以下的各正史中莫不谈论了上面各种问题，而且除去专门的篇章叙述

外，还在其他地方提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。如“史记”有河渠志、平准书等专门记录江流河川与民生经济；在齐太公世家中，又谈到太公望在封地营邱（山东临淄北）的经营。这都说明了所谓地理条件涉及的广泛，以及相互间的重要关系。顾祖禹的“读史方兴记要”是谈当时全国的地理条件之巨著，虽然相关各问题间的综合讨论并不够，但也说明了地理环境在古代的重要性。

古代的首都基本上是以安全为最先的考虑；因然地势好并不能保证绝对地安全，但相对地可以减少敌人的威胁。若以宋代首都开封而言，实在不是一个地势良好的城市，较之洛阳为差，比于长安则更差。

开封的地理位置在黄淮平原，是暴露在黄河边的一片平地，除黄河外没有任何屏障。太行山以东的这块大平原原本就无险可守，北方长城一线在后晋建国时就落入辽国之手，就是石敬瑭割让给契丹人的燕云十六州之地。如果辽人由今天北平骑兵南下，主要的国防线只有拒马河一道，这里已是涿县附近，也就是宋、辽的分界的白沟河。敌骑沿着今平汉铁路一线直下，不要几天就可到达黄河边，若一渡河就直抵开封城了，距河仅五十余里之地，就这一方面看来，几乎是完全没有国防线可言。

至于山西一面，太原向北尚有五台山及雁门关之险，敌骑不易南下，况且陕县与潼关之间又有函谷关可守；若由黄淮平原南下，由今陇海铁路向西进，在荥阳县以西尚有险可据，故而洛阳形势堪称险固；所谓四关之险要在此，左成皋、右函谷、前有伊阙、后背孟津，说明了开封不如洛阳。而长安在关中之地，自古就是形势最为险要的都邑，也就不必多说了。

在形势如此不利之下来建都，自要担负极大的风险；北宋初朝野人士也并非不知这问题的重要性，但客观之条件使得无法改变。因之，宋初建都这一国策就算是确立了。现在再举几个例子来看宋人的大体观点：

张方平说开封是四通八达的交通要地，但形势不如长安与洛阳。自从朱全忠建都于此，到石敬瑭割地，就造成了与强敌共平原之利，所以五代以来倍受外敌的威胁，就是因为没有屏障以致国家根本没有安全的庇护。宋代建国并非不知利害所在，但实因有不得已的原因，就是看在漕运的便利。据此可以维持北方国防所需，也就是形成国家以兵力来维护安全；兵力是要依靠粮草、物资来维持，而粮物是以漕运来充实，漕运就端靠河渠为主了。由此可知张方平确有的清楚观察，开封正是北方漕运的中心。

张洎也谈论到宋代因国防上的需要，必须有数十万兵马驻防北方，比以前的各朝代都负担为重，这大批兵马的资源就要以开封为供应中心。

宋太祖赵匡胤的晚年，曾经打算迁都洛阳，然后再移往长安，可以使国都有安全的屏障，这么一来，国家也不再因国防空虚而养大量的兵马，财政上也可以减轻许多负担，社会民生因之可以得到舒缓。但当时封为晋王的宋太宗，也就是赵匡胤之弟光义，却着重于现实漕运之利，主张仍旧以开封为首都。宋太祖颇不以为然，认为不出百年，天下的民力终究会消耗殆尽。他看到了因国防空虚而大量养兵，大量养兵必易带来财政上的大量负担；而且养兵未必真能解决国防问题。很不幸地，宋太祖的见解果然言中，百年后北宋终因财政上的困难，激起了变法改革。

范仲淹也曾经为建都问题提议迁都洛阳。并且建议应先



在洛阳一带普遍设立储仓，规划建都的一切设施规模，但为主政者视之为迂阔之论，意思是说不着实际的纸上理论，不如迁就现实的开封之利。

在宋真宗时，辽国大军南下，情势紧张之际，国家根本发生动摇，那时朝廷议论纷纷，迁都的意见也随之而起，如王钦若主张迁往南京，陈尧叟主张迁往四川，似乎没有主张往西到洛阳、长安的，足见这两地虽然形势较佳，但仍有其客观条件不足之处，这也是接下来我们要了解的。

原来北方经长期战乱，社会民生屡遭破坏，洛阳与长安两个古都受到的残破也多，大规模的兵灾从东汉末年开始，如董卓之乱，史书上说关中一带三百里地不见人烟，而黄巾之乱使北方生产力几陷于停顿，当曹操迎汉献帝就是迁移往许昌，当时维持一个中央政府所需，就只余下那里可供应得起，这也无非是为了迁就客观之条件。

南北朝初期北方战火不灭，北魏以后渐渐复兴，随唐又以关中地区为国家根本，两代的经营又恢复了盛况。但从唐代中期的安史之乱开始，北方又面临长期而大规模的动荡，加上地方各藩镇武力引起的兵乱，以及秦宗权、黄巢等大乱，不但长安、洛阳一带破毁极重，整个北方的生产已不能维持，物资几乎全要仰赖南方的供应，愈往后愈加强这种情势。

南方供应往北的物资都是由运河来运输的。由扬州北上沿今陇海一线通到开封，这是隋炀帝所造的通济渠。开封有河渠通黄河，再沿河可往洛阳，以至于长安，这两地也都有河渠接黄河来转运。换言之，唐代中期以后，物资非要靠南方给养，而运河就成为北方的生命线了。

若是接连黄河的渠道已于坏，那么当物资运到开封以后，其余转运就全靠陆上运送，所耗费人力、财力、时间等都非